

# 论张衡人生哲学的特色

## ——兼论儒道互补

刘周堂

张衡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末年，这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从和帝重用宦官郑众诛灭外戚邓氏起，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外戚相互倾轧、交替掌权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虽然这种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桓、灵时期那样不可收拾，但是东汉王朝的肌体的确已经开始变质、腐烂。尤其是到安帝、顺帝时，衰败的速度更在加快。这样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贤人失志、处世维艰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和张衡同时的许多文学之士或陷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而不能自拔；或抗言直行而丢掉了性命；或志不得伸而老死户牖。而张衡却在那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时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青史留名的政治家。张衡之所以能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除了其“天资睿哲”的禀赋之外，我以为主要得力于他的人生哲学。

《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常从容淡静”“不慕当世”，似乎张衡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但从《应间》、《思玄》两赋来看，事实并不如此，他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决非得力于他的“不慕当世”。张衡少年时“遂遍五经，贯六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儒家那种积极用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主张无疑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这不仅从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二京赋》来规劝统治者应该去奢崇俭、珍惜民力的创作动机和实际行动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他“自去史职，五载复还”后所作的《应间》中看到他那颗激动不平的心，同时还可以从他身处危境时挥笔写成的《思玄赋》中找到答案。如果说从《二京赋》讽谏力的大为增强可以看出青年时的张衡匡时济世的强烈愿望，积极要求实现人生价值的话，那么从《应间》和《思玄赋》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老年时的张衡在怀才不遇、身处维艰的情况下，又是怎样地激情难捺，去调和内心矛盾以重振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继续实现的心灵轨迹。《应间》、《思玄》二赋再现了一个正直且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如何解决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既保持节操又要实现自我价值的矛盾的内心世界，它是张衡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

张衡在安帝时担任太史令，然而，“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对于这件事，范曄在本传中说是“衡不慕当世”所致，所以他认为张衡对此并不介意，“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但我们翻开《应间》就知道张衡对此并非不介意，而是耿耿于怀。这篇赋

模仿东方朔《答客难》的形式，假设问者对自己“曩滞日官，今又原之”加以责难，然后再对责难一一加以回答。问者认为做官应该“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象咎单、巫咸、申伯、樊仲那样“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应该“垂翅而还故栖”。谁都知道，东方朔的《答客难》是作为虚设责难然后加以辩解以抒发自己不得重用的牢骚哀愤之感的，张衡模仿它而作《应间》，显然也是借问者的责难来发抒自己“自去史职，五载复还”的怨愤之情。所以问者的难辞实际上就是张衡此时内心世界的忠诚坦露，其对官复原职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这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一、他在回答问者的责难时，主要的是“应之以时有遇否”。他说：“公且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所丁不齐，如何可一！”认为自己和孔子一样都是生不逢时，所以才道不得济。而周公之所以能推行自己的主张治理天下，就在于恰逢其时。二、正因为他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特别羡慕那种君臣遇合、上下无猜的情形：“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酈生。当此之会，乃鼙鸣而螿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羡慕是人的主观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又特别希望得到满足所产生的一种情感意识。一般说来，羡慕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张衡羡慕高祖君臣同心戮力，和衷共济，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生不逢时，未遇明主的强烈不满，而这种情感的根源就在于他垂翅故栖。三、他在写作《应间》的同时还写了《鸿赋》一篇，可惜此赋正文已佚，仅存序言，现全文录之：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鸱鸢已降，罕见其俦。而轂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予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他以鸱鸢自比，伤怀才不遇，其忧愁苦恨洞然可观。虽然其赋文不可得见，但从其慨然多绪，聊以自慰的创作动机也可揣测大概。以上可以充分证明：张衡对于自己五年之后官居原职是大为不满的。因此范晔说他“不慕当世”并不符合张衡的实际情形。

对于外界异己力量强加给个人的现实处境不满，自然就会牢骚满腹，这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你牢骚再盛，但事实终于难以改变。那么如何对待怀才不遇的现实，如何在这种现实面前选择好自己的方位，往往是个人自我价值能否继续实现的关键。面对垂翅故栖的现实，张衡坦然地将它归之为命运。他说：“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羨崩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偃而不思。”既然人的穷达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个人的主观行为不能有所作为，强求与潦倒对于实现人生的价值都只能是有损而无益。对于人生道路中的曲折与坎坷应该采取“得之不休，不获之吝。不见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忧”的态度，不要有通达的喜悦，也不要穷困的苦恼，摒除物欲的追求，听从命运的安排。基于这种认识，张衡甚或认为通达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按照“物壮则老”的道理，通达的背后就是穷困。所以他又说：“子睹木雕独飞，愍我垂枝故栖，吾感去鸱附鹜，悲尔先笑而后号也”，这显然是以道家的处世观来自我解嘲，以麻醉自己的灵魂。麻醉剂固然不能治病，但它确实也能在治病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道家的处世观就曾使张衡那痛苦不安的心灵趋于某种程度的缓和，使他能现实的骤然打击下恢复冷静而更加清醒地审视现实并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没有这种麻醉，没有这种暂时的心理平衡的话，那么可能导致他做出某种不理智的选择。

张衡年轻时“通五经，贯六艺”，在他的心理沉淀中儒家思想的基因无疑是最多的，他对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主张也拳拳服膺。因而他既没有躺倒在命运之神的怀抱里等待好

运降临后再去重振自我，也没有皈依道家之说而消极自沉下去，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命运的安排。在他看来，既然命中注定该有如此，那么我就暂且将它作为托身之所。这样既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研究天文、阴阳、历算，又可以居官履职等待时机。于是他决定“聊朝隐乎柱史”。“朝隐”较之“退隐”自然要优越得多。退隐意味着人生价值部分甚至全部泯灭，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屈从，它于世无补，于己也益处不大。而“朝隐”进可以升官加爵以实现兼济天下之志；退可以修身养性以独善其身；中可以保持现状借职务之便继续实现人生的价值。张衡这期间在科学上的成就显而易见就得力于这种“朝隐”的策略，而他后来被提升为侍中也未尝不与他“朝隐”有关。如果他当时愤而退隐，候风地动仪也许就不会在他的手中诞生，后来也许不可能在河间惩办豪强。“朝隐”是张衡在处世哲学方面的一个新贡献，它既是对道家避世退隐人生哲学的一种积极改进，也是对儒家积极入世人生哲学的一种策略补充。在此之前虽也可能有人实践过，但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并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策略，却是始于张衡，后来王维等人的亦官亦隐就是顺着这条路子走去的。

“朝隐”是张衡在环境与愿望发生尖锐冲突而自身又难以很快改变现状，但又不肯屈从退让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处世策略，它的实质就是“且韞椟以待价”。因此就在这期间他仍没有忘记政治上的进取。他一方面忠守太史令之职潜心研究候风地动仪；另一方面仍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变化。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表现自己对于社会的作用和责任，以引起君主对自己的重视，从而改变目前这种使人晦气的状况。这时正是汉顺帝永建、阳嘉年间，政治日逐腐败，顺帝虽然采取过一些措施试图阻止衰败的加剧，但无奈他是由宦官孙程等人扶上台的，再加之他年纪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顺帝本人在东汉末年的几个皇帝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清醒开明一点的。据《后汉书·顺帝纪》载，他一即位“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这显然是为了开张圣听、重振朝纲。不管其效果如何，总算有了进言的机会。张衡抓住时机，立即进呈《上顺帝封事》，阐述自己对国内连年灾异缘起的意见。第三年他又上《陈事疏》，要求顺帝加强皇权，改变“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的现状，刹住奢侈之风。接着他又上《论贡举疏》尖锐地批评了当时选法浮滥、贡举不实的情形，要求改变当时那种重文章、轻品行的做法。同时又上《请禁绝图讖疏》。阳嘉二年四月京师发生地震，五月顺帝下诏：“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答戒异。异不空六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张衡立刻呈上《京师地震对策》，认为“天人感应，速于影响”，朝廷变更以前的察举孝廉制度，频繁更换郡国守相，以及官风腐败、上陵下替是导致地震的直接原因。张衡在垂翅故栖期间接连不断地上疏献策，这固然凭着职务上的关系，但也未尝没有求进用之意，其朝隐的内涵应是十分清楚的。惟如此，张衡在失意时既实现了心理平衡，也没有放弃进取，而且还在失意的岗位上做出了重大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也许是张衡那些言辞急切的策、疏终于使顺帝龙眼大开，发现这个多年滞留史官职务的张衡颇具政治才能，于是将他迁为侍中。它的职能是“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sup>①</sup>即做皇帝的高级顾问，张衡终于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树大当风，官高多险。有一次顺帝问他：当今天下人最痛恨的是谁？宦官们害怕张衡说出自己，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只好“诡对而出”，然而宦官们还是“恐为其患，遂共谗之”。<sup>②</sup>张衡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不免使他刚趋于平静的心田又掀起阵阵波澜，任凭佞臣胡作非为，于心不忍；针锋相

对，难免有杀身之祸。命运又一次将张衡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抉择是否正确关系到人格的高低和人生价值的轻重，他需要探求出一条在险恶乱世中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思玄赋》就是这种探求的记录。这篇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离骚》相似。他既猛烈抨击了珍莠贬良、黑白颠倒的反常世道：“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鞿要褻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也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的浩叹和才不见用、知音难觅的苦闷：“幸二八之逆虞兮，喜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音而莫闻。”同时还表现出一种身处乱世中的危惧之感：“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僻以危身。”真是“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与《应间》相比，忧愤明显地加深了，增多了，而且还多了一种危惧之感。全生保身的道家思想和任重道远的儒家人生观使他陷入了“恐渐染而无成，留则蔽而不章”的矛盾之中。他去请教历史，历史告诉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断。窆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芜。王肆侈于汉廷兮，卒衔恤而绝诸。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窦皇后由祸得福，子孙繁盛；王皇后却由福转祸，自裁无后。颜涿久为郎官终遇汉武得以拔擢；董贤少为三公最终却死无葬地。无情的史实告诉他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如前所述：张衡在“自去史职，五载复还”的苦闷中，曾借助“命运”熨平了心中的皱褶，又以积极迎接命运安排的姿态实践了“朝隐”的策略，从而在那个甚为痛苦的时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现在“命运”再次闯入他人生的旅途，但张衡的处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复原职的牢骚主要是怀才不遇，太史令的工作也基本上是舞文弄墨。怀才不遇不容易使人真正安于命运，太史令的职务自然可以让他继续放射出能量。因而以“朝隐”的方式来接受命运的安排获得了成功。然而现在张衡已经完全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他已经失去了为太史令时那种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性。接受命运的安排就意味着对现实的屈从和自身价值的毁灭，所以他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朝隐”于世，他必须成为命运的主人来回答现实的挑战，方能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在张衡的心理积淀中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基因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对历史重新进行审察和反思之后，他发现个人的命运虽然难以预料，但“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棗忱而佑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古老的儒家天道观使张衡把个人命运的最后决定权还原到了自己的手中。他举出商汤王虔诚祈祷和宋景公诚心谢罪终于获得好报，魏颍行善终于在危难时得到杜回结草之助来证明：“有无言而不仇兮，又何往而不复”。只要自己志洁行廉、处义行仁，最终是不会有灾祸的。因此，他决定：“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这样，消极的宿命论在张衡那里变成了积极的有命论，从而使他在成仙既不可能，不干世事又与自己的本性相左、而处境又确实险恶的情况下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回志竭来从玄祺，拱我所求夫何思！”表明他已经再次实现了心理平衡，终于在险恶现实中探求出了一条如何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考察他探求这条道路的轨迹，我们发现他是将道家老子的祸福相随的方法论人为地嵌入儒家周公“天命仇忱”的天道观，并以东汉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观与之相应证，从而得出人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个人自己手中的积极性结论，表现出对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主体性的认可和肯定。张衡对于儒家天命观的积极使用表明他在追求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道路上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更加坚定地把握住了自己。道家委顺自然、安于命运处世哲学和儒家建功立业、弘毅弘道的人生观在张衡的人生哲学里得到了高度的、和谐

的统一。他虽然也讲命运，但却又受制于儒家天道观，而这种以人事为本的天道观实质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客观异化物，并反过来用它作为主观行动的精神依据，从而越过命运的樊篱，走上积极自为的道路，这比《应间》中积极迎接命运的安排又前进了一步。如果说《应间》中的“朝隐”多少还带有一点等待命运的内容的话，那么《思玄赋》中的“玄祺”则已完全是自己在主宰命运了。这表明张衡的人生哲学较之以前更为成熟，更为实用了。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就在写作《思玄赋》的第二年，张衡担任了河间相。两汉的相是中央派到封国去掌管政事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郡守。张衡显然是把它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好机会，面对“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局面，“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擒。上下肃然，称为政理。”<sup>④</sup>这与他当年面对宦官的淫威：“诡对而出”不同了，而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之所以如此敢作敢为，联系《思玄赋》就可知道其中的奥秘：惩处奸党豪右，上合天理，中顺典宪，下符人情。坚实的心理基础是他严惩豪强的精神支柱，因而表现在行动上也就是无所畏惧的，从而使他成了政绩斐然的政治家而名垂青史。试想如果当年张衡在邪恶势力的威慑下就退隐田园，或者在惶恐不安中陷入宿命论而未能摆脱以实现新的心理平衡，甚至在复为太史令时就痛不欲生，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不可能得到这样最大限度地实现。从张衡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以追求自我解脱为核心的道家的人生观对于在黑暗现实中艰难奋斗的士大夫实现自我价值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就在于人性受到压抑时而产生的极度烦闷和不安情绪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为继续实现人生价值提供现实保证。但是，它必须以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相统属，甚至还要接受儒家天道观的制约，才能重新把握个人的主体性，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张衡之所以常常能从道家消极人生观的命题中引申出积极的意义，原因也就在这里。这中间实现痛苦后的心理平衡是重要的，但打破这种一时的平衡，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心理平衡则更为重要，张衡人生哲学的特色也就在这里。

#### 注 释：

- ① 鲁道夫·阿恩海《艺术与视知觉》第625页  
② 《后汉书·百官志》  
③④ 《后汉书·张衡传》

## 名 人 言

钱基博说：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哲学解释自然，科学实验自然，文学描写自然。

\*

\*

胡寄尘喻唐诗如中国水墨山水，善写意，宋诗如西洋油画，善刻画。

\*

\*

邹韬奋创办刊物，无不认真对待。他说：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

(三山辑)